

# 解殖視野下的東亞歷史重構：專題導論

萬毓澤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

這是《台灣社會學》規劃的「解殖、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專題的「下集」，收錄了兩篇論文：魏龍達的〈日本殖民主義與台灣、朝鮮的解殖暴力〉（以下簡稱魏文）與韓承樺的〈重新認識中國：從市面上幾部中國史論著出發的討論〉（以下簡稱韓文）。魏文從比較歷史社會學的角度，探討同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與韓國，何以在 1945 年帝國瓦解之際呈現截然不同的暴力型態；韓文則聚焦於台灣社會如何透過翻譯出版與知識傳播，逐步建構一種挑戰「中國／中華史觀」的新知識秩序。兩篇論文的研究對象與方法取徑各異，但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問題：殖民經驗如何形塑（後）殖民社會的社會關係與知識結構？

## 解殖暴力的比較分析

如魏文所引述，Fanon 在《大地上的受苦者》中斷言「解殖永遠是一種暴力的現象」，並主張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暴力關係具結構性根源，被殖民者只能透過暴力來淨化殖民經驗造成的心理創傷。然而，這種將暴力本質化的論述是否適用於所有解殖經驗？魏文處理的經驗謎題，恰恰對此提出了挑戰：台灣與韓國同為日本殖民地，但在 1945 年帝國瓦解之際，卻呈現截然不同的暴力狀態。

在韓國，日本宣布投降之際，長期壓抑的社會矛盾突然爆發。民眾自發攻擊警察機關、焚燒殖民象徵的神社，其暴力對象不僅針對日本殖民者，也指向那些被視為「民族叛徒」的本地合作者，包括親日地主、協助日帝動員的地方仕紳，以及在基層執行殖民壓迫的韓籍警

察。這股暴力浪潮在美軍接管南韓後依然延續。1946 年的大邱事件中，憤怒的群眾對韓籍警察施以極端殘酷的報復，包括虐待致死、剝皮和活埋等駭人手段。相較之下，戰後初期的台灣則顯得異常平靜，被形容為處於「政治真空」的狀態。日本總督府在政權交接前仍有效維持秩序，台灣菁英普遍表現出謹慎克制的態度，對於協力者的清算主要停留在報刊上的道德譴責，並未演變為流血衝突。

針對上述差異，魏文建構了一套分析框架，涵蓋「戰前因素：殖民統治與社會關係」以及「戰後因素：地緣政治與政權建構」兩個層面。在戰前因素方面，魏文提出了兩項假設：其一，韓半島遭受的經濟剝削比台灣更加嚴重，因此戰後解殖過程的暴力程度也更高；其二，朝鮮社會存在的協力者數量及層級均高於台灣，因此解殖時的清算行動也更為激烈。既有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支持這些看法：日本在朝鮮推行的土地調查和農業政策導致大批農民失去土地，佃農比例隨之飆升，農村陷入普遍貧困。相較下，台灣總督府的土地政策在客觀上保護了土地私有權，而對蓬萊米的改良等殖民地農業發展措施，亦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農民的生活水準。政治吸納方面，殖民地警察體系中韓籍警察的比重遠高於台籍警察；這支龐大且深植社會各階層的協力者隊伍充當了殖民壓迫的直接執行者，自然也在解殖之時首當其衝地遭到報復。

在戰後因素方面，魏文的假設是：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既不像北韓的蘇聯佔領當局那樣積極清算協力者，也不像南韓的美軍政府那樣高度依賴協力者，因此台灣解殖時引發的暴力程度低於韓半島。在半島北部，蘇聯扶植具抗日游擊經驗的左翼共產黨人，將肅清親日派與土地改革結合，不僅默許民眾的復仇渴望，甚至加以利用，將其轉化為鞏固新政權的社會革命。在半島南部，美國為了維持穩定並防止共產主義擴散，大舉留用殖民時期的官僚和警察，同時與地主、商人等右翼菁英結盟，此舉進一步加深了民眾的怨懟。反觀台灣，蔣介石對日本採取「以德報怨」的政策，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時攜來自身的統治班底，並未完全倚賴殖民時期的協力者體系；因此，台灣社會內部潛伏

的緊張關係並未因新政權的到來而激化為暴力衝突。

從解殖的視角來看，魏文的貢獻在於重新審視了暴力在解殖過程中的地位。魏文透過台灣與韓國經驗的對比證明：解殖暴力並非不可避免，而是取決於具體的殖民結構遺緒與戰後政治選擇。這提醒研究者不能將暴力視為解殖的宿命，而是必須關注殖民統治方式、社會矛盾的累積程度，以及新政權處理殖民遺緒的策略如何共同形塑解殖的過程及後果。

### 「解殖中國」：為何與如何？

「解殖」取徑的核心在於處理殖民遺緒，而其中的關鍵又涉及如何重構知識體系，企及某種「認識論的正義」（epistemological justice），也就是如 Bhabra（2021: 76）所言，要追問「那些形塑我們理解自己與他人的『大敘事』是否恰當」。這些大敘事「決定了誰擁有權力（以及為何擁有權力），使其能在面對他人不同知識主張所揭示的問題時，仍能堅持自身知識的權威性」。

近年來，英語學界出現一股「解殖中國史」的學術潮流，對傳統中國史書寫中的帝國敘事與漢族中心主義提出根本的質疑。其中，《歷史期刊》（*The Historical Journal*）2024 年刊載的圓桌論壇已出版中譯本，在中文版序言中，主編譚吉娜（Gina Anne Tam）開宗明義即說：

「解殖歷史」不應止步於批判西方帝國主義，而應承擔批判帝國主義本身這個更宏大的使命。這要求我們直面、批判中國如何通過帝國主義手段去構建並維護其想像中的主權疆界，並審視清帝國佔領現今新疆、臺灣與西藏地區時，採用的手段與當年鄂圖曼帝國、羅曼諾夫王朝或美國等帝國擴張何其相似。（Tam et al. 2024 / 楊婷譯 2025: 8）

韓文正是在這個「解殖中國」的學術脈絡中，從台灣的知識生

產與接受角度提供了重要的補充視角。作者採取知識史的取徑，以 Peter Burke 提出的「知識秩序」(orders of knowledge) 概念為框架，探討 2010 年至 2020 年間台灣書市出現的中國史論著如何挑戰或改變既有的知識秩序。作者將分析對象劃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海外中國通史，包括日本講談社的《中國·歷史的長河》、岩波書店的《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以及美國的《哈佛帝制中國史》。第二類則是面向社會並具現實關懷的中國史著作，包括杜正勝的《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和劉仲敬的著作。

韓文比較了新、舊知識秩序在「中國是如何形成的」問題上的敘述與評價差異。黨國體制下的「中國／中華史觀」傾向將漢族及其文化置於歷史主體地位，將歷史視作一系列王朝的更替，並透過教育與文化傳播普及這種史觀。新知識秩序則強調「中國」並非天然存在的單一單元，必須拆解其時空敘事的同質性。講談社、岩波書店與哈佛這三套著作皆試圖重構中國歷史的時空邏輯，挑戰中國國族論述的基礎。特別是岩波書系以空間（中原、江南、草原、海域）作為歷史編排的主軸，彰顯「橫向時間軸互動與連接的複雜進程」。這類新的知識秩序凸顯了中國歷史進程的複雜度與異質性，不再把「統一」當作某種歷史目的論，而只是政治社會組織方式的其中一種選項。

值得注意的是，韓文並未迴避新知識秩序內部的張力與潛在問題。以劉仲敬的著述為例，韓文認為這種「非中國視角」的歷史書寫雖極具政治渲染力，但史料基礎薄弱，更接近英文語境裡的“anti-historical”，即不顧或刻意扭曲歷史。韓文提醒：「即便再細緻的史學研究成果，若最終僅被扁平化為裂解『中國』縫隙的資源，那麼台灣的中國史知識秩序亦可能像另一台失速列車般，為了掙脫既有的知識殖民而走向另一個極端，陷入 anti-history 的困境——不再立基於知識的立場，淪為單純的『反中國』論述。」這種反思，正是解殖研究需要的批判精神。

## 對話與啟示

表面上，魏文對台韓解殖暴力的比較研究，與韓文對中國史知識秩序的分析，處理的似乎是不同的問題：前者回溯 1945 年前後的歷史情境，後者則聚焦於當代台灣社會如何「認識中國」。然而，若從更寬廣的解殖視野出發，兩者實際上共同指向同一組更深刻的問題：殖民經驗如何長期形塑（後）殖民社會的制度安排、社會關係與知識結構？不同形式與層次的解殖，在何種條件下才有可能？更重要的是，當台灣處於「一個中國」歷史目的論與地緣政治拉鋸的最前線時，「中國」對台灣究竟意謂什麼？

推展解殖研究時，必須嚴肅看待兩點。其一，解殖研究本身具有不可迴避的政治性與倫理要求。研究者既需揭露殖民機制如何滲透至日常、制度與知識生產，也需意識到自身的知識位置與侷限。其二，解殖不能被化約為政治表態或情緒動員，而是需要以嚴謹的學術論證為基礎，提升看待歷史的複雜度。韓文對 anti-history 的提醒，正指出當「解殖」被簡化為反向本質化、只以否定「中國」為目的時，反而會落入新的知識貧乏，無助於真正鬆動殖民性。

由於台灣是多重殖民性的交匯點，解殖面臨的課題尤其複雜：漢人移民對原住民族施加的殖民壓迫、「一個中國」的大一統歷史敘事，乃至戰後冷戰結構下美國主導的軍事－政治－知識體系等，都意謂台灣不可能僅以單一方向或單一對象展開解殖工作，而是要求我們發展更具包容性的分析框架，來同時處理對外與對內交織的殖民遺緒。本專題收錄的四篇論文（本期的魏文、韓文，以及前一期的李文、梁文），正是朝這個方向展開的書寫。

## 參考文獻

- Bhambra, Gurinder K. 2021. "Decolonizing Critical Theory?: Epistemological Justice, Progress, Reparations." *Critical Times* 4(1): 73-89.
- Tam, Gina Anne, James A. Millward, Catherine Lila Chou, Taomo Zhou, and James Gethyn Evans. 2024. "Roundtable: Decolonizing Chinese Histor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67(1): 148-197. 楊婷譯，2025，《解殖中國史》。有理文化。